

经济发展与文化革新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蔡立雄^{1,2}, 王红莉¹

(1. 西北大学 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陕西 西安 710069; 2. 龙岩学院, 福建 龙岩 364012)

摘要: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与之相适应的观念文化和制度文化以实现低成本、高效率的发展。观念文化中的意识形态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共同信念, 制度文化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共同知识, 成功的意识形态和制度使经济主体对未来形成稳定的预期, 降低了个人与社会协调和集体行动以及制度维护、执行的成本, 提高了经济主体创造财富的激励, 从而使经济实现长期增长。但文化有自身的发展规律, 文化的厚度、强度、柔性、开放性影响着文化变革的成本, 采取适当革新方式以降低成本是实现文化革新的基本条件。

关键词: 经济发展; 文化功能; 文化革新; 革新成本

中图分类号: F01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5831(2008)05-0035-07

一、导论

经济发展是当今世界各国发展的主题。自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科学以来, “什么是经济发展的源泉”始终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内容, 新制度经济学产生以前的经济学家主要把它解释为劳动、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积累以及各种生产要素在社会生产各部门以及在部门内各部各厂商之间的优化配置, 把经济资源配置过程简单地理解为市场上的“弱肉强食”过程, 但对于世界上的各国为何会出现兴起和衰落的现象以及经济内部的经济周期性现象都没有作出令人信服的系统解释, 正如奥尔森所指出“他们追溯了江河源头的小溪与潮流, 但没有解释注入这些源头的雨水是怎样形成的。同时他们也没有说明经济发展的渠道是如何被堵塞的——即某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为什么受到阻碍”^[1]。诺斯也认为“适用于经济发展和经济史的新古典经济学, 可以很好地说明某一时期经济的成就, 或借助比较统计资料来比较经济在一个时期的成就; 但它没有, 也不说明变革的动力”^[2]。而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 “诸如储蓄率高、受教育程度高、技术创新活跃等因素, 是与经济增长相伴随的发展的表征, 是经济发展理论所要解释的事实, 而不是原因”^[3]。他们认为适当的制度才是一国经济长期发展的根本原因。新制度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在经济学领域掀起了一场革命, 也为深陷于“经济停滞”或只“增长而不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带来了福音, 使他们更多地关注先进制度的学习和引进以及对本国有碍于经济发展的制度的变革。

但发展中国家在制度学习、引进、变革中并非都一帆风顺, 受到来自旧制度与传统文化观念的强大抵抗, 从而使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面临新的变数, 如何突破旧制度与传统文化观念约束以发展经济成为各经济转型国家的主要任务。不同国家基于对制度、制度与经济的相互关系的不同看法采取了不同的经济转型方式和突破路径, 中国采取了利用新的制度和文化并在经济发展中对传统制度和文化进行改造的路径, 实行渐进式改革方式, 取得了重大成功; 俄罗斯采取利

收稿日期: 2008-06-10

作者简介: 蔡立雄(1973-), 男, 福建漳州人, 西北大学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博士生, 龙岩学院副教授, 主要从事政治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研究。

用外来制度和强制文化替代传统制度与文化的方法,实行激进式改革方式,在改革初期深陷经济衰退的泥潭,在后来又不得不对改革进行反思并采取有条件倒退的方式才恢复经济增长。两个代表性国家的改革实践为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制度变迁和经济与制度、文化间的关系提供了现实素材。笔者的主要任务是回答:文化是如何发展的?文化与经济如何相互影响?一个地区文化的特性如何影响制度变迁进而影响经济增长?如何实现文化的有效变革?

二、文化及其发展

(一)文化的定义和层次

从最一般意义上说,文化包括物质文化、行为(制度)文化(含经济制度、家庭制度、政治法律制度以及人们参与社会事务的行为方式等)和精神(观念)文化(含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等)。从这3种文化的层次来说,精神(观念)文化最为根本,它构成人们世界观的基础,社会心理是一种社会意识的初级形态,而意识形态是理论化、系统化的社会意识,是社会意识的高级形态,是观念文化的核心;制度文化相当于制度经济学中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加总,属于文化的中间层次,是人们在社会交往、社会生活中所创造的、用于维系社会存续和发展并满足人们需要的那部分文化;而物质文化则是文化的表层形式,是人类为满足自身的物质需要在一定的观念文化的指导下,遵循一定的制度文化规则,对物质对象进行改造的产物,是观念文化和制度文化的物化。现代一般从人类学、文化学、社会学和民族学意义上理解文化的内涵和外延。1952年美国文化学家克鲁伯和克拉克洪在他们的《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批评评述》中对各学科文化的定义加以综合和归纳,得出了200余种关于“文化”的界说,其中以英国著名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其《原始文化》一书中下的定义最为经典: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杂整体^[4]。这一定义包括了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笔者也是在此意义上使用文化的概念。传统文化不外是人们在以往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才能和习惯的复杂整体。由于意识形态构成观念文化的核心,为便于分析,我们将文化再细分为3个层次:意识形态、非正式制度(含习惯、道德等)和正式制度。在已往的制度分析中,往往把意识形态归为非正式制度的一部分,我们认为这是不确切的,在诺斯眼中,意识形态与制度是两个并列的范畴,他在《制度、意识形态和经济绩效》一文中指出:制度和意识形态共同决定经济绩效^[5]。

(二)文化发展的机理

不同学科有不同的文化发展观,刘象愚在《文化观念的演化》一文中对文化人类学中文化进化论、文化传播论、文化历史学、功能主义、心理文化分析等流派的文化演化观进行了系统的归纳。在经济学中

也有3种不同的文化发展观:一是建立在进化论基础上的演化经济学的文化演化观,强调文化是一种无意识的自然演进过程,制度“通过人类行动而不是人类的设计而有机孳生地出现的,因而是个人行为的结果,而不是人类集体行为的结果”^[6]。二是制度经济学的文化发展观,以凡伯伦、康芒斯为代表的制度主义和以科斯、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在制度或文化发展上的看法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制度是人有意设计或选择的结果,“社会制度是由计划者界定的各种行为规则,这些界定了不同的 n 人博弈。因此对这些作者而言,博弈的规则与它的制度结构是同义的”^[6]。三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发展观,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定的经济发展要求要有一定的与之相适应的文化,“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7]。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旧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及人的意识也或快或慢地必然发生变革,但文化的发展与经济并非总是同步的,它具有自身的规律性和独立性。综合不同学派的文化发展观,结合中国的实践,我们可以发现,文化发展的基本机理如下。

1. 在自身的积累与反思中发展

文化具有继承性,后人不断地总结、反思前人的思想观点、社会行为,提出新的观点和行为准则,实现发展,所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就是这一种写照。市场经济制度的产生也是文化长期积淀的成果,“制度结构和具有市场理念的个人又是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认为市场可以在没有历史、没有制度结构和没有市场理念的条件下形成并发挥作用的想法,是一种天真的想法”^[8]。

2. 在竞争中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不同的学说流派为了更好地争取民众和诸侯国的支持,一方面不断地同其他学说开展论战,另一方面又不断地完善自己的学说,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格局,这一时期是中华文明史上的一个文化大繁荣时期。

3. 在交流与综合中发展

不同的学说互相交流、互相碰撞、互相融合,在历史上是新文化产生的一种主要方式。古希腊文明之所以那么发达,与它实行开放性的经济政策,从而能有效地吸收当时亚非欧各地的不同文明进行再创新有很大关系;宋朝朱熹创造性地融合了佛、道、儒三家学说,使儒家学说臻于完善并在中华文明中实现了统治,值得一提的是,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商业发达且经济开放的社会。

4.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发展

这是文化发展的基础性机制,所谓“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廉耻”,经济的发展使人们产生了更高的文化需求,从而促进文化发展。四大文明古国和古希腊的文化繁荣是建立在这些国家发达的农业或商业基础上;近代以来英国、美国的文化优势也

是建立在强大的经济实力基础上。发展还意味着社会经济的变化^[1],这些变化产生了新的社会经济问题,对文化提出了发展新的学说以解决这些问题的要求,同时也为此准备了基本素材。

5. 在传播中发展

文化的传播包括自觉传播和自发传播,自觉传播在传统社会中主要靠教育和政治推广,政治推广如秦始皇的“书同文”、汉武帝的“独尊儒术”、隋唐及以后的科举制度等,市场经济的观念和制度在开始也是靠政治强制而推广,“自由放任本身也是由国家强制实施的,通向自由市场的道路,也是依靠大量而持久的统一筹划之干预而加以打通并保持畅通的”^[9]。通过文化传播以发展文化的机理是通过影响、改造人的社会心理,进而为新意识形态和新制度的产生和推广奠定基础。

三、文化与经济发展相互影响的机制

(一)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理论化、系统化的社会意识,提供了一个社会共同的信念

马克斯·韦伯认为新教伦理强调的功能主义与禁欲主义在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功能主义将获取经济利益作为人生的最终目的,将谋取利益看作是增添上帝的荣耀,信徒要以入世的精神去尽可能多地获取物质利益,禁欲主义强调反对非理性的使用财产,限制消费欲求,鼓励将财富转化成投资并以正当的、合乎道德要求的方式去发展生产实现资本增殖^[10]。在创造财富与获取利益成为社会共同信念的条件下,与资本增值有关的一切行动合理化了,经济增长受到激励,与此同时,一切与财富创造相违背的制度丧失了合理化甚至合法化的基础,资本主义制度从而得以建立并进一步促进了经济发展。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中,意识形态是经济长期增长的源泉。

1. 意识形态是一种世界观,是人们行动的思想先导

意识形态“是由一种有内在联系、通观世界的看法构成”^[2]。市场经济本身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它所强调的自由、自愿、等价的交易,是人们进行经济决策的基础;它所确立的追求财富最大化的理念是技术进步、经济增长的动力所在。

2. 意识形态提供了一种信任机制,能有效节约交易成本

意识形态“是使个人和集团行为范式合乎理性的智力成果”^[2]。一个社会共同的意识形态也是社会各方长期博弈的结果,它“与个人所理解的关于世界公平的道德伦理不可分割地交织着”^[2]。因此它使人们在行动之前即拥有对他人行动合乎规范与公平伦理的基本信任,而不用花费太多资源于搜寻关于他人的价值特征和行为特征的信息,从而可以减少交往中的博弈频率,产生交易成本的节约。在中国农村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化过程中,宗法方面的意识形态所提供的信任格局在组织最初的

农村资源参与市场化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3. 意识形态的世界观性质有简化决策过程、节约决策成本的功能

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和快速变动性往往使人的决策行动超越其理性边界,产生不确定性,人们往往借助意识形态对变化了的现实进行判断,从而使社会生活简单化、清晰化,以节约理性计算的过程和成本,诺斯认为意识形态“提供一种‘世界观’使决策过程简化”^[11]。

4. 意识形态是某种具体的制度安排得以嵌入一定制度结构的基础,能有效减少白搭车倾向

意识形态是行动的思想基础,现有的制度结构是在已有意识形态的约束下形成的,新的制度安排只有符合这种意识形态的要求,才能妥帖地融入现有的制度结构,成功的意识形态“应当说明现存产权结构和交易条件怎样成一个大系统中的一部分”^[2]。某种制度安排从孤立上看,可能是一种无效的安排,但当它被现有意识形态接纳时,却是有效的。丹尼尔·克莱因以18世纪美国农场主和工商业认购股票支付修路费用为例说明,人们之所以不采取搭便车行动,是出于一种社会责任感,这种责任感来自负筛选激励,这在一个封闭和均一的社会集团中尤其有效^[12]。为此斯蒂格勒和贝克尔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意识形态的存量越大,则人们对周围的制度安排的合理性的信息就越强,个人的搭便车和其他机会主义动机倾向越小”^[3]。

5. 意识形态是节约集体行动的组织成本和执行成本的关键

共同的意识形态能有效整合一个团体全体成员的意志和思想,赢得团体成员的忠诚,从而使采取集体行动的组织成本下降;意识形态对人们的行动提供了一种内在的强制和外部评价机制,任何搭便车行动和有违于事先约定的集体行动规则的行为都将承担额外的精神负担,使人们的行动不再按有关成本与权益简单的、享乐主义和个人的计算来行事,从而节约了集体行动的执行成本。

6. 意识形态提供了激励机制

如果一定的组织目标能为在一定意识形态所形成的公平观、价值观所接纳,它将激起集体成员为实现共同目标而行动的热情和信心,并愿意为实现整体和长远的目标而牺牲个人的、短期的利益。

7. 对意识形态的投资有外部性

对意识形态的投资不仅能增加意识形态的总量和巩固程度,还具有维护制度稳定性和提高产权保护效率的外部性。当一种制度不符合意识形态要求时,人们将拒绝接纳这种制度;反过来,当一种制度符合意识形态时,人们将维护并适应它。因此当有效率、低成本的制度安排被引入或采用时,进行意识形态投资以提高其合法性和合理性是必要的。对意识形态的投资使人们相信现有制度的合理性,一切侵犯产权的行动将与意识形态的公正性要求相违背,从而

使产权受侵犯的可能性下降。

8. 经济发展对现实的改变是意识形态改变的基础

马克思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诺斯也认为“意识形态的不同起源于地理位置和职业的专门化”^[2]。当经济发展使社会现实发生重大改变时,新的不同于以往的经验就产生,“当个人的经验与他们的意识形态不一致时,他们便改变自己的思想观念”^[2]。但意识形态的变化往往滞后于经济的变化,原因可能一是由于旧的意识形态的强势存在,二是由于人们对经济是否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有不确定性;当然马克思也提出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意识形态的变革可能先于经济变化,如19世纪的德国,但从整体经济史来看,经济发展仍是意识形态产生的基础,当时德国意识形态的先进性与欧洲其他国家资本主义的先进性为它所提供的替代经验是不可分的。

9. 意识形态的演进是解释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长期的经济变革之所以发生,不仅因为……相对价格的变化,而且由于意识形态观点的演进”^[2]。意识形态提供了人们行动的世界观、公平观和价值观。共同的成功的意识形态降低了个人与社会协调和集体行动以及制度维护、执行的成本,从而使经济实现长期增长,经济增长使个人产生了新的经验并促进了分工和专业化,经济交流,使处于不同地理位置的人和从事不同工作的人的不同经验得以交流,进而促进人们改变思想观念(或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改变反过来又成为长期经济变革的原因。

(二) 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一起提供了人们行动的共同知识

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制度有以下一些基本经济功能:节约功能、约束功能、规范功能、激励功能、创造和扩散信息功能、制度提供了人类互相影响的框架、特定制度所包含的社会价值具有伦理教化作用、制度有保存与巩固社会发展成果作用等。但我们认为这些功能都是一些衍生功能。制度的基本功能应是提供了人们行动的共同知识⁽²⁾,其理由有二:一是从制度基本定义导出。凡勃伦认为,“制度实质上就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某些关系或某些作用的一般的、确定的思想习惯”;今天的制度,本质上就是当前“公认的”某种生活方式;肖特认为“A social institution:在一人口群体P中,当其中的成员在一重复出现的境况Γ下,作为当事人常规性的R只有在下列条件下成为人口P中的共同知识时,它才成为一种institution”^[13]。综观这些定义可以发现,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制度是人类行为的规范或约束规则的总称,它是为一群人共享并共同遵守的知识、规则或信念系统,由此形成一种稳定的社会秩序,任何单独偏离规则的行动都会使当事人受损,因而当制度形成后在一定程度上是自我实施的。二是从制度的

形成与维系的基本特征导出。制度无论是自发形成还是有意建构,一种行动结果要成为制度,其基础必然是共有信念和共同知识,青木昌彦认为制度是共有信念的自我维系系统,是由有限理性和具有反思能力的个体构成的社会的长期经验的产物^[12];制度也许存在于人们意会的理解之中,也许存在于人们头脑之外的某种符号表征之中,但在任何情况下,某些信念被参与人共同分享和维系,由于具备足够的均衡基础而成为制度;一些没有正式化的实践只要参与人认为它们是域内在状态的相关表征,就可以看作是制度,而当参与人对它们的信念动摇了,它们就不再作为制度存在了。可见,制度产生的基础是共同信念,某些表征要成为制度必须被所有参与人共享而成为共同知识,当共同信念动摇时,共同知识就解体,以此为基础的制度就会消亡。

作为共同知识的制度提供人们行动的基本框架,使人们对行动的结果产生稳定的预期。理性预期学派认为:人们在形成对未来预期时会有效地利用所获得的信息,采取行动受到预期的很大影响,而预期的实现又依赖于现在的行动,因此行动和预期是一个相互自我实现的过程,和谐地融为了一体^[14]。共同知识使人们对信息解释有共同的知识基础,减少了不确定性,从而节约了交流、互动、交易的成本;共同知识使人们获得了对行动的共同评价基础,违背共同认知的行动将受到惩戒,从而使社会有了进行有序竞争和合作的条件,促进了社会分工的发展和效率的提高;共同知识还限制和规范了人们的行为选择集合与方向,人们要想在行动中获利,只能采取与集体共同知识要求相匹配的行动,从而抑制了机会主义的行动,当共同知识与经济发展的要求相一致时,人们追求个人利益的行动必然同时增进社会利益;某些共同知识本身就具有经济价值,如对货币、产权保护的一致同意等。不仅适当的制度构成经济长期增长的条件,经济的发展反过来也促进制度变迁,经济发展改变了要素和产品的相对价格,拓展了制度的选择集,使现有的制度结构失衡,进而促使人们重新计算制度变革的收益和成本,制度变迁因而得以发生。

经济发展对不同的制度类型的影响并不是同步的。一般认为非正式制度具有自我实施的性质,具有较大的路径依赖性,而且在社会制度结构中占据主体地位。诺斯认为正式制度“即使在最发达的经济中也只是决定选择的总约束中的一小部分,人们行为选择的大部分行为空间是由非正式制度来约束的”^[11]。因而非正式制度的变迁速度较慢,“从变革的速度来看,正式约束可以在一夜之间发生变化,而非正式制约的改变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5]。正式制度具有强制实施的性质,因而在掌握权力的少数人通过制度设计或引进可以在短期内实现强制变迁,但正式制度的引进移植受到非正式制度的强大约束,“即使能从国外借鉴良好的正式规则,如果本

地非正式规则因为惰性而一时难以变化,新借鉴来的正式规则和旧有的规则势必产生冲突。其结果,新借鉴来的制度根本无法执行”^[15]。而非正式制度并非总是能移植的,“一种非正式规则,尤其是意识形态能否被移植,其本身的性质规定了它不仅取决于所移植国家的技术变迁状况,而且更重要的是取决于文化遗产对移植对象的相容程度”^[16]。

经济的发展要求对不适应经济发展要求的文化进行革新,但这种革新是否能成功,取决于行动主体对成本与收益的计算。诺斯认为制度变迁的成本包括实施成本、组织成本、阻滞成本,只有当革新的收益大于成本时,革新才能成功。我们无意在此重复诺斯的分析,在第四部分我们着重从文化本身的特性分析其对革新成本的影响。

四、影响文化变革成本的文化特性

文化变革的成本受变革的速度、难度和可供选择的文化目标的可获得性影响,为此一个地区文化的柔性、开放性、厚度、强度将直接影响文化变革成本。

(一)文化的柔性,即文化本身学习能力和适应外部环境进行调整的能力

一种文化如果善于学习其他共存的优秀文化成果,不断实现对自身的改造,意味着在文化革新中将面临更少的阻滞成本和组织成本。文化的发展虽具有一定独立性,但它仍是社会大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其他的政治、经济子系统的变化不可避免要求文化子系统发生相应变革。其他子系统的变化被人们感知并使之产生了新经验,这种新经验与旧的文化产生冲突,形成要求对现存文化进行变革的社会心理预期。当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心理被理论化、系统化而形成新的社会意识形态,进而在共同信念的指引下,人们形成新的习惯和道德评价机制等共同知识,意识形态与非正式制度的变革使旧的正式制度变得不合理,因为民众对新共同知识的支持还可能使以旧共同知识为基础的旧正式制度丧失合法性依据,正式制度的变革由此必然发生。处于一定文化区的民众对外文化的接受能力、对新事物的感知和总结能力越强,文化的革新速度越快,革新成本就越低。

(二)文化的开放性,即一种文化与其他文化交流的广度和深度

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看,一种文化与其他文化接触越多、交流越广泛越深远,所获得的信息就越丰富,发现优秀文化成果的概率越大,在文化发展中的试误成本也就越小,由此可以实现低成本的革新。

(三)文化的厚度

制度厚度是新经济地理学近年提出的一个概念,意指:(1)强烈的制度存在;(2)在各种制度间产生高度的相互作用,促进相互合作、交流及反射网络的形成,在地区制度安排方面,产生显著的同构;(3)制度厚度取决于主体结构,通过联合建造和集体存在,将部门主义和制度之间的冲突降到最低;(4)上

述三方面而导致一种涵化和集体动员,使各部分围绕特定的议程、项目或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共同目标,形成共同感^[17]。受此启发,我们认为文化厚度是指在历史发展中积累起来的文化的量的大小、结构的稳定程度、同构性程度及其对生活在一定文化区间的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影响力。文化底蕴越厚就越稳定,实现变革的各种成本也就越高。中华文明是一个延续了五千年不间断的文明体,其中文化传统已经内化为中国人的心理特征、成为人们的行为习惯,无疑是一种最具厚度的文明,这也决定了对它进行变革的难度。但中国各区域的文化厚度又不同,西部和中原地区作为中华文明发源地和曾经辉煌的见证,厚度最大;而东部沿海地区一直处于对外交流的前沿阵地,开放度较强,文化厚度相应地较薄。从农村与城市制度厚度看,农村厚而城市薄,其原因在于农村社会的相对封闭性和与传统文化相适应的农耕方式仍占主体地位。

(四)文化的强度,即一种文化在整个文化体系中的地位及其稳固程度

一种文化在整个文化体系中的地位越高,受到外来挑战越小,在民族心理方面就越容易自我满足,从而形成高水平的均衡和路径依赖,变革就越困难,成本越高昂。中国在宋以前,儒学未占绝对统治地位,能积极吸收、改造外来文明以实现发展;在宋以后,中华文明与周边文明的差距越发明显,儒学也没有了竞争对手,文化发展的速度减慢乃至停滞并被其他文化超越。文化强度影响变革成本还表现为重建新强势文化的困难,否定一种文化强势存在的合理性,要求有一种新的强势文化来取代它,以便为稳定的社会秩序和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共同信念和共同知识,而旧文化的强势程度决定了它对新文化的抵抗的强度,从而使文化变革的不确定性增加。

当前中国改造传统文化的高成本在于整体受教育程度不高导致的学习能力低下、内陆地区开放程度不足增加文化的整体变革成本、延续五千年的文化构成稳定的民族心理降低了文化本身的柔性、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旧的共同信念与共同知识不断被打破,但新的共同信念与共同文化仍未清楚显现,精神空虚与制度缺失影响了社会和谐,新文化形成的困难加大了经济增长和改革的成本。

五、实现中国传统文化变革的条件和途径

(一)实现传统文化变革的条件

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传统文化实现变革的同时,也为这种变革准备了条件:首先是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为中国低成本地吸收外来先进文明提供了机遇。其次是信息技术的发展,降低了文化的搜寻成本和试误成本,也为快速地传播新观念、新知识提供了平台,从而有助于在较短时间内形成新的意识形态和制度。再次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一方面不断冲击着人们的旧观念,另一方面又提高了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二者的合力易于使人们采取集体行动变

革旧文化、建立新文化。最后是中国共产党的强有力的领导,长期的荣辱与共和使人民站起来、富起来的业绩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化、合理化地位得到巩固,从而有利于全社会形成统一的意识形态和心理预期,也有利于降低制度变迁的阻滞成本和协调成本,如果没有人民对共产党的信心,很难相信哪一个社会能让几千万工人下岗、上亿民工流动而不引起大规模社会问题;一个执意于改革和有远大志向的政党长期执政还有利于提高制度变迁效率,降低制度的实施成本。

(二) 实现文化革新的基本途径

意识形态的深层性、非正式制度的惰性和难移植性决定了它们变革的高成本,因此它们也必然成为文化革新的重点,我们对文化革新途径的设计也主要围绕它们来进行:一是积极参与全球化,拓展对外交流的广度和深度,在对外交流中增进知识、变革观念、获取替代经验。二是积极总结经济发展成果,经济发展是文化发展的基本动力和物质条件,经济发展要求形成与之相适应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公平观。市场经济的创富本性并由此形成的一系列实践不断冲击人们安贫乐道、重土恋家、求稳怕险的自然经济观念和等、靠、要的计划经济观念,现代市场经济的稳定发展、可持续发展、有序发展理念又对传统市场经济中只要个人利益不要整体利益、只要经济利益不要社会利益观念提出变革要求。新的理念、经验、思想作用于社会形成新的社会心理,这种社会心理要变成文化变革的实际行动,需要建立在新的社会心理和经验基础上的系统化的理论支撑,也就是要实现经济理论的中国化,使之与我们的民族心理中的优秀成分相兼容,才能成为全民共同的信念和共同知识。三是加强新思想、新观念的传播,要通过学校教育、传媒和各种宣传手段促进新共识的形成。这些年部分地区只注重经济增长,忽视人们观念的改造和制度建设,结果是人们在改变了非市场经济的观念和制度的同时,却没有形成带普遍性的稳定而先进的制度和观念,结果是饱了口袋、空了脑袋,出现了伦理、价值危机。先进的制度和思想当然也可以自发形成,不过这种自发形成的时间要极其漫长(凯恩斯说:在长期我们都将死去),通过宣传、教育结合经济实践的冲击是打破不合时宜的文化、形成新文化的最经济途径。四是鼓励人口流动。双向的人口流动是稀释旧文化厚度、传播新文化的极为有效的形式。历史上北方人口向南方大规模迁移加速了南方文明化的历史进程,改革开放以后大规模的民工潮加快了农村经济、社会和思想的现代化。五是在反思与综合中创新。文化尤其是观念文化和非正式制度的延续性、继承性特征,决定文化的革新不可能割断与旧文化的联系实现全新的建构。俄罗斯在改革初期试图在极短的时间内用新文化(制度)代替旧文化(制度),留下的更多的是教训而

不是成功的经验;中国先进行体制外的改革,不断使旧文化稀薄化和弱化,进而以改革的成功经验冲击旧的观念文化和制度文化,实现经济的稳定发展;在改革中期,中国部分人也曾试图全盘否定传统文化而代之以在西方实践成功的观念和制度,这种浪潮只存续了极短的时间就被传统文化的强烈反弹所抑制。为此要构造新的共同信念和共同知识,应对传统文化(包括传统马克思主义)进行反思,努力发掘其中与现代经济社会相兼容的、有积极意义的成分,以此为基础广泛吸收外来优秀的文化成果,在综合中实现创新,才是最理想、成本最低的途径。

六、结论

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要有与之相适应的观念文化和制度文化,以便为它提供合理化的支持并提供人们行动规则和基本框架,进而实现低成本、高效率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不仅提出建设新文化的必要性,同时也为它准备了物质基础和经验素材。观念文化中意识形态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共同信念,制度文化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共同知识,共同信念使经济主体拥有共同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公平观,成功的意识形态降低了个人与社会协调和集体行动以及制度维护、执行的成本,从而使经济实现长期增长;共同知识使经济主体对未来形成稳定的预期,减少了不确定性,从而节约了交流、互动、交易的成本,还提供社会进行有序竞争和合作的条件,促进了社会分工的发展和效率的提高等。但文化与经济发展并不是同步的,文化有自身的发展规律,文化的厚度、强度、柔性、开放性影响着文化变革的成本,当前要降低文化革新的成本,必须充分利用当代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各种有利条件,同时采取适当的变革路径,通过外来文化引进和经济发展的新经验冲击旧的社会心理,使社会产生文化革新的预期,然后通过发掘传统文化中的积极成份、结合新经验、外来文化加以理论化、系统化,产生新的意识形态和制度的备选方案,最后通过教育、宣传和人员交流使备选方案成为新的共同信念和共同知识。

注释:

- (1) 诺斯认为四种经济变化将影响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否定个人资源增长的产权方面的变化;要素或产品市场的交易费用从合理的交换率下降;个别劳动集团的相对收入地位下降;信息费用的减少,使个人发现别处可能有不同的、更为有利的交易条件。道格拉斯·诺斯:《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厉以平译,5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 (2) 共同知识是哲学和博弈论中用于描绘一个群体对于某一特定事实的认知程度的概念,当“一件事一旦在某一群体中成为共同知识,他对这件事的理解、他认为别人对这件事的理解以及他认为别人认为其他人对这件事的理解等等,都已经达到完全统一,不再有任何层面的不确定性”。张圣平:《偏好、信念、信息与证券价格》,14页,上海:上

海三联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参考文献:

- [1] M·奥尔森. 大国兴衰探源[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2:23.
- [2] 道格拉斯·诺斯. 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M]. 厉以平, 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 [3] 谭崇台. 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108-109、256.
- [4] 刘象愚. 文化观念的演化[J]. 学术界,2006(3):7-24.
- [5] 诺思. 制度、意识形态和经济绩效[M]//詹姆斯·A·道,等. 发展经济学的革命. 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09、110.
- [6] 韦森. 经济学与哲学:制度分析的哲学基础[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66.
- [7]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91.
- [8] 吴易风. 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与思潮[M]. 北京: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2005:391.
- [9] 汤敏,茅以軾. 现代经济前沿专题(第二册)[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242.
- [10] 马克斯·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 于晓, 陈维纲,译. 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 [11] 诺斯.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 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1994:53、49、49.
- [12] 青木昌彦. 比较制度分析[M]. 周黎安,译.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54、11-16.
- [13] 肖特. 社会制度的经济理论[M]. 陆铭,陈钊,译.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16.
- [14] 帕特里克·明福德. 理性预期宏观经济学[M]. 方福前,刘小波,译.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4-7.
- [15] 青木昌彦. 什么是制度,我们如何理解制度[M]//周黎安,王珊珊,译. 孙宽平. 转轨、规制与制度选择.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52.
- [16] 卢现祥. 新制度经济学[M]. 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3:256.
- [17] 吕拉昌,魏也华. 新经济地理学中的制度转向与区域发展[J]. 经济地理,2005(4):437-441.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nalysi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Renovation

CAI Li-xiong^{1,2}, WANG Hong-li¹

(1. Center for Study of China Western Economic Development,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China;
2. Longyan University, Longyan 364012,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achieve a low cost and high-efficiency development,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need ideal culture and institutional culture adapt it.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ideology in ideal culture provides common faith and institutional culture provides common knowledge. Because of the successful ideology and institution, the economic principal part will form a stable expectation to the future, lower the cost of personal correspond with society, collectivity action, institutional maintenance and performance, inspire economic principal part to create wealth, thus economy will continual increase over a long time. But culture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ren't synchronous, cultural development has its own rule, the thickness, strength, flexible, opening of culture affect the cost of cultural change, adopt an appropriate way to low reform cost is the basic condition that carries out the cultural renovation.

Key words: economic development; cultural function; culture renovation; renovation cost

(责任编辑 傅旭东)